

高尔夫球场屡禁不止， 折射监管缺位

文\叶祝颐

陕西榆林沙漠中“长”出高尔夫球场，河北鹿泉违法占地上千亩建高尔夫球场，贵州贵阳占地数千亩建高尔夫别墅，广东湛江占地约1600亩兴建高尔夫球场，北京永定河畔建了“高尔夫走廊”……2011年，违法兴建的高尔夫球场屡屡被媒体曝光。这些违规高尔夫球场被曝光以后，鹿泉的高尔夫球场在国土资源部督办下终于被封，但更多的高尔夫球场仍在和公众“躲猫猫”，交完罚款继续营业。(1月4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虽说高尔夫球场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地方形象，抬高周边地价、房价，但是，地方建设高尔夫球场应该实事求是、量力而行，不能违背国家土地制度与节能政策。高尔夫球场不仅违法占用大批土地，而且大量消耗水源，污染环境。在建设节约型社会成为共识，资源紧张警报一再拉响的当下，地方显然不能坚持打造大量占用土地、消耗水资源的“高尔夫名片”。

中央已经三令五申要求停止高尔夫球场建设。2004年初，国务院紧急下发《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》，2011年4月以来，国家整治违法违规高尔夫球场的风声越来越紧，继11个部委联合发文之后，2011年7月初，国务院又再次督促国土资源等部门抓紧清理整改高尔夫项目。然而，一些地方仍在顶风“作案”，连沙漠地区、缺水地区也建起了高尔夫球场。2010年5月，据国土资源部通报显示，我国经过正式审批的高尔夫球场仅10家左右。然而，据媒体报道，132家高尔夫围堵京城，13万余亩土地被围占；陕西榆林在沙漠上修高尔夫，周边农民无水喝；大连高尔夫球场浇草与民争水，周边村民无水做饭，河北上百家高尔夫球场偷采地下水……这其中有多少违建的高尔夫球场可想而知。

在极度缺水的华北地区，高尔夫球场为了保持茵茵绿草，不断抽取地下水灌溉草坪，导致地下水被严重超采。专家更是称深层地下水恢复需要上万年时间。以极度缺水的省份河北为例，按国际界定标准，人均水资源量500立方米以下属于极

度缺水，河北省人均水资源量只有305立方米。每年全省提供的水资源量为167亿立方米，而需求量却达到220亿立方米左右，不足的部分只有依靠超采地下水补足。地下水本来就因生产生活需要被严重超采，大批违建高尔夫球场再如此深度攫取地下水，不仅打破了水资源平衡，而且可能给地区发展，子孙后代带来“灭顶之灾”！

一些违规建设的高尔夫球场即便被曝光、查处，仍然和公众“躲猫猫”，交完罚款继续营业。鹿泉高尔夫球场即便在国土资源部督办下终于被封，政府仍然没有采取措施复耕。开发商表示，将集中精力将该处建设成为一个集观光、旅游、住宿和休闲于一体的旅游度假村。高尔夫球场替换成度假村，耕地仍然被无端消耗，国家高尔夫球场建设禁令形同虚设。地方政府如此以罚代管、消极作为，显然难以服众。

当然，从根本上讲，要遏制住违建高尔夫球场，完善政绩评价体系，丰富政绩评价内涵，多从民生角度看政绩，少以形象工程论英雄，把任性的权力关进法律制度之笼，为高尔夫球场建设热降温提供监管原动力，十分重要。■

农民工“市民化” 成本省不下

文\武洁

当前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约为8万元/人左右，以2.5亿农民工为基数计算，总成本将达20余万亿元。分解到20年，则每年所需资金为1万亿元，约占2010年8.3万亿元财政收入的12%左右。(1月4日《人民日报》)

20余万亿当然不是个小数目，既然农民工“市民化”并非说句话那么简单，而是需要掏出真金白银，并承担相当不菲的成本，农民工“市民化”这事儿，看来还得从长计议，至少，20万亿从哪儿出，是个无法绕过的前提。

应该承认，对于高速城市化的中国而言，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让城市融入数量如此巨大的农民工，的确并非易事。毕竟，一个人进入城市，其实并不只是地理位置的改变，作为城市居民，公共配套的供给，社



会保障的到位，住房、交通、医疗、教育需求的配置到位，无一不需要真金白银。而在急剧城市化的过程中，城市对于外来人口的接纳能力赶不上城市化和外来人口涌入的速度，的确也是个普遍现象。在这方面，即便是发达国家，其实也无法完全规避。

而在这一过程中，无法享受“市民”待遇的外来人口，必然会在权利和权益各方面遭遇不公。尽管身处城市，却仍然被城市视作外人，既不能享有发展的成果，更无从融入城市生活。由此而形成的落差，不仅是对外来人群权益的侵犯与歧视，更将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隐患。在这方面，也并非没有教训，不能融入的结果，必然是隔膜的产生与冲突的加剧。

农民工“市民化”，不仅仅关乎农民工的应得权益，同样也关乎城市本身及其原住市民的福祉。事实上，一个城市的人口，显然不仅仅是有户籍的常住人口，外来人口同样占据着相当的比例，既然如此，城市的公共资源配置，显然不能只看到常住人口，而更应基于包括外来人口的真实人口。无论我们承认也好，不承认也罢，外来人口其实都在城市中客观存在，这一群体终究要产生交通、教育乃至医疗的需求，真要让城市的公共功能不出问题，相应的公共供给当然得跟得上，否则的话，无视现实人口需求的后果，必定是导致公共资源的稀缺，交通拥堵、医疗缺口等诸多不便，其实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。

一言以蔽之，农民工“市民化”其实不仅仅是为了给予外来人口同等的待遇，同样也是确保城市公共供给不落后于需求的前提条件。只有将外来人口的需求充分纳入，公共资源的配置也更多建立在真实人口的基础之上，这样的发展与规划，也才能更加合理和到位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20余万亿的农民工“市民化”成本，既然省不下，何不该花花呢？■